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马志雄[a]，张银银[b]，丁士军[a]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a. 公共管理学院；b.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关键词： 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生计资本；收入水平；兼业化；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6)03－0054－09

一、引言

失地农户的生计不仅是一个农户自身发展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土地征用极容易引起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冲突，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多数是由征地所引起的。诸多研究表明，失地将使农民面临失地又失业的困境[1－4]。针对近年来大规模征地引起的社会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政府要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同时完善失地农户的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征地是外部力量对农户生计系统的冲击，征地必然引起农户福利状况的变化。失地意味着农户赖以开展生计活动的生计资本数量及其结构的急剧变化，农户必然主动或被动的采取策略应对，这些生计策略决定了新的生计是否可持续。在农户的众多生计策略中，生计多样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农户生计多样化不仅与其它生计策略存在着很强的关系，而且本身被认为是生计可持续与否的关键[5－6]。然而，传统上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研究侧重农户在经营农业方面的多样化，比如种植品种多样化或养殖品种多样化，而缺乏将非农活动纳入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分析。对于中国的小农来说，非农收入已经逐渐成为其最重要的收入途径，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3 年全国层面农户工资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已达 45.25%，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包括农业经营和非农经营）占纯收入的比重已经下降到 42.64%。因此，在对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考察中，亟需关注家庭整体的生计策略多样化。

本文的研究思路基于以下方面：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多样化的总体关系如何；中部地区失地农户的生计策略多样化呈现怎样的变化特征；对失地农户来说，生计资本如何影响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

收稿日期： 2016－02－03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6.03.0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32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4132）

作者简介： 马志雄（1983—），男，广东汕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社会保障。E-mail：mzhxio@aliyun.com

二、文献评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回顾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策略是指家庭凭借自身资本要素配置不同的资本，选择不同的生计活动，并创造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以便实现他们的生计目标的行动[5,7-8]。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十分丰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3 种：一是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或是粗放化，二是劳动力流动，三是生计多样化[8-9]。本文在表述中同时使用“生计策略多样化”和“生计多样化”，两者含义相同。

总体上看，生计资本影响或决定生计策略的实施。农户生计策略不是自由的，而是受经济、社会和资本的约束[10]。Moser 认为生计策略的实施能力主要依赖于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11]，而熊吉峰和丁士军的研究则认为，农户生计策略更多依赖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12]。苏芳等指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还受到所从事行业的调节[13]。除了农业经营策略，非农生计策略也会受到农户生计资本影响[14]。总之，生计资本的性质和状况是核心，它决定了农户采用何种生计策略[15]。

在众多的农户生计策略中，生计多样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生计多样化既包括农业经营活动多样化，也包括非农活动的多样化[16]。已有经验研究表明，总体上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多样化的选择，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会限制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策略[17,13]。关于生计资本与生计多样化的关系，有的研究认为生计资本与生计多样化存在正向关系，如 Abdulai 和 CroleRees 对农户收入多样化决定因素的研究[18]，阎建忠对农牧民生计策略的研究[19]。而另一些研究表明生计资本与生计多样化存在倒 U 型关系，如徐雪高认为农户的财富水平总体与生计多样化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20]，陈传波认为农户多样化行为与绝对收入水平之间呈倒 U 曲线的趋势[21]。

首先，已有研究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收入多样化进行考察，但因为农户不同年份的收入有波动，某些项目的收入可能为零或者负值，因此从收入角度考察生计多样化，并不完全合理。其次，已有研究关注了各种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但缺乏专门从生计多样化角度考察各种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已有研究以财富或收入情况作为生计资本状况的指标，含义比较笼统而缺乏科学性。第三，已有关于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化影响机制的研究，没有区分多样化能力与多样化行为的差异，农户多样化能力是由禀赋决定的，而农户多样化行为受到包括禀赋在内的更多因素影响。概念的混淆导致相关研究对生计资本与生计多样化影响机制没有取得较一致的结论，直接影响各种干预政策的设计。第四，在农户生计策略的众多研究中，关于失地农户生计策略的分析十分缺乏，而关于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的思考则更为阙如。总而言之，失地农户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失地农户有别于传统农户，征地对生计多样化影响所呈现的特点需要特别关注，这样才能实施区别于传统农户的政策干预措施。

（二）分析框架

为了深入揭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的实施，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策略进行一般性的理论分析。

首先，生计多样化是获取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传统上认为农户属于风险规避者，农户生产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而是将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对于风险规避型的农户来说，生计多样化是应对生计风险的一种重要手段，多元化能降低生计脆弱性，保障食物安全，减少饥荒威胁[5-6,10]。对于我国现阶段家庭承包经营模式下的小农户来说，单纯依靠农业经营的生计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争取多样化的生计渠道，获得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是他们获得可持续生计的必然选择。而对于未卷入市场的小农户来说，多样化更是增强其生计安全的重要生计策略。

其次,生计多样化并非是获得可持续生计的唯一途径。农户并不一定是风险规避者,农户厌恶风险、规避劳役、追求利润最大化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同一个农户可以同时具有以上多种偏好[22]。生计多样化对小规模农户在防范和处理风险中十分有效,但是这种处理策略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对低收入农村地区具有积极正面效应的生计多样化,对于已经卷入市场的失地农户来说,实际上可能损害了生计效率,生计策略多样化未必是最佳的决策。征地区域往往不是偏远的山区,而是交通相对便利、土地比较平坦、距离城市中心较近、具有区位优势的城郊地带。失地农户在征地后的生计策略不一定是追求多样化,因为多样化降低了其专业化劳动所获得的更多收益。然而,农户家庭经营的市场交易特征和农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农户的专业化生产同样难以抵御风险[23]。由此可见,农户是在多样化与专业化之间寻找某种可以承受的风险平衡点。对于失地农户来说,农户赖以发展其多样化生计的自然资本的减少,将使农户寻求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从兼业的模式走向更加彻底的"洗脚上田"。

再次,生计多样化作为一种可行能力,其核心影响因素是生计资本。这种影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农户只有拥有一定的生计资本,才能获得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二是,当农户拥有了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之后,却不一定要选择多样化。生计多样化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行为,多样化行为受到各种外部环境与决策动机的影响,而多样化能力主要是由禀赋所决定。对于具有理性决策能力的失地农户来说,自然资本受到外部干预减少,为了获得可持续生计,必须根据新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采取新的生计活动的功能性组合,实现其可以达到的生计多样化策略。

三、失地前后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变化特征分析

课题组2013年在南方地区选择几个中等规模城市,选定近3-5年有土地被征收的农村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区域,在各个市区内选择2-3个征地较为典型的经济开发区域,再对区域内随机选取村庄和失地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文以江西九江和湖北襄阳的620个有效农户调查样本(九江194个,襄阳326个)进行分析。这两个地区在各自省份属于较大城市,受访的农户均居住在交通较为方便的平原地带,较能代表我国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失地农户的状况。受访农户平均被征地的次数为1.22次,最大值为7次,最小值为1次,最近一次征地时间的中位数是2010年。征地前和征地后分别指最近一次征地的前一年和2012年,对于最近一次征地时间为2012年或2013年的农户,则回溯调查前一次征地情况。

(一)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

失地农户收入来源的调查包括4大类14小类(表1)。总体上可以看出,参与某项生计活动的农户比重与该项活动的收入比重变化并不同步,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高低是有差别的。具体的,征地后拥有种植、养殖和农业补贴等3种生计渠道的农户比重降低幅度较大,但其收入比重的降低幅度则要少得多。而征地后拥有非农经营、本地打工、外地打工、公共部门工作,以及获得社会救助、亲朋馈赠、养老金、其他转移性收入、存款利息、租赁收入、股票收益等11种生计渠道的农户比重大于征地前,但其收入比重全部呈现正的增加。

对于失地农户来说,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直接创造价值的主动收入活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农民相对被动获得的收入。前两类收入活动是失地农户可以主动调整的生计活动,更能够体现农户应对失地冲击所采取的生计多样化策略。如表1所示,农户征地前的种植和养殖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19.07%和7.60%,但征地后这两项的收入分别下降到只占1.33%和0.82%;征地前非农经营活动、本地打工和外地打工构成农户的重要生计来源,而征地后这3种生计来源的收入比重进一步提高(分别提高1.88%、14.10%和3.05%)。

表 1　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种类变化情况

	类型	(1)征地前农户比重(%)	(2)征地前收入构成(%)	(3)征地后农户比重(%)	(4)征地后收入构成(%)	(3)-(1)	(4)-(2)
经营性收入	种植活动	94.19	19.07	20.48	1.33	-73.71	-17.74
	养殖活动	64.19	7.60	18.87	0.82	-45.32	-6.78
	非农经营活动	14.35	16.84	18.06	18.72	3.71	1.88
工资性收入	本地打工	56.29	33.23	70.65	47.33	14.36	14.10
	外地打工	17.74	14.63	19.52	17.68	1.78	3.05
	公共部门工作	7.42	3.59	8.87	5.92	1.45	2.33
转移性收入	社会救助	3.71	0.17	6.94	0.37	3.23	0.20
	农业补贴	62.58	0.93	42.58	0.70	-20.00	-0.23
	亲朋馈赠	13.23	1.12	17.58	1.37	4.35	0.25
	养老金	19.03	1.50	38.71	2.93	19.68	1.43
	其他转移性收入	2.74	0.18	4.19	0.38	1.45	0.20
财产性收入	存款利息	28.23	0.87	37.42	1.28	9.19	0.41
	财产租赁收入	3.06	0.25	9.68	1.13	6.62	0.88
	股票收益	0.65	0.02	1.13	0.04	0.48	0.02

(二)生计多样化与兼业化

本文以是否参与农业经营，是否参与非农经营和打工活动，将农户划分为纯农户、兼业农户、非农农户和无就业农户。征地引起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大幅减少，而非农农户和无就业农户明显增多(表 2)。征地后兼业农户的减少，无就业农户的增加，都表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水平在下降。农户兼业与否是考察分工专业化的重要视角，有的研究将农户兼业分为农业为主的一类兼业和非农为主的二类兼业，这些分析都以收入份额的度量为前提。但是，农业的自然风险以及生产的跨年度性导致农业收入在不同年份具有较大波动性，因此以收入份额的视角看待失地农户兼业问题并不是一个普适的方法。失地前后，农户的兼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表 2 所示，征地前的纯农户为 21.77%，而征地后的纯农户只有 2.26%，征地前兼业农户比例为 73.71%，而征地后兼业农户比例降到 25.48%。征地后非农农户和无就业农户比例大大增加，分别达到 63.55% 和 8.71%。

表 2　失地前后农户兼业变化情况

农户类型	含义	征地前(%)	征地后(%)
纯农户	仅从事农业经营，未从事非农经营或打工活动	21.77	2.26
兼业农户	既从事农业经营，又从事非农经营或打工活动	73.71	25.48
名义农户			
非农农户	仅从事非农经营或打工活动，而没有从事农业经营	4.19	63.55
无就业农户	既没有从事农业或非农经营活动，也没有从事打工活动	0.32	8.71

从农户农业经营活动的变动视角，也可以看出征地后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双双下降的趋势。征地前从事农业经营而征地后不再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占 68.07%，分项看离开种植和养殖的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 74.19% 和 46.6%。总体上只有 27.74%(27.42% +0.32%)的农户继续经营农业，而有 72.26%(68.07% +4.19%)的农户不再从事农业经营(表 3)。

表3 失地前后参与农业经营的农户比重变化

征地前→征地后	种植活动(%)	养殖活动(%)	农业经营(%)
有→有	20.00	17.58	27.42
有→无	74.19	46.61	68.07
无→有	0.49	1.29	0.32
无→无	5.32	34.52	4.19

(三)生计多样化与劳动力流动

失地农户的另一重要生计策略是劳动力流动。失地农户劳动力流动可分为本地流动和外地流动。本地流动是指户内劳动力离开农业经营,在本地从事非农经营、农业打工、非农打工或公共部门工作;外地流动是指户内劳动力在县外从事非农打工和非农经营。由于户内成员是否属于劳动力是随着时间变化的,有的家庭成员在征地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有的家庭成员则在征地后退出劳动力市场,故这里劳动力流动变化的计算是基于户内劳动力总体流动数量,而非基于具体的户内成员流动情况。征地后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和兼业化变动趋势相互呼应,而劳动力的非农流动与生计多样化关系并不明确。表4显示了失地前后农户劳动力流动情况,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征地后56.94%的农户在本地农业经营领域减少劳动力,这一比例远大于增加劳动力的农户(1.29%);与此同时44.03%的农户增加了本地非农活动的劳动力,这一比例远大于减少劳动力的农户(6.13%);9.19%的农户增加了外地非农活动的劳动力,这一比例略大于减少劳动力的农户。失地农户劳动力流动的突出特征是集中在本地非农流动,可能的原因是,征地区域处于城市周边地区,城镇化吸纳新劳动力的能力较强。

表4 失地前后农户劳动力流动变化情况

	增加(%)	不变(%)	减少(%)
本地农业经营	1.29	41.77	56.94
劳动力非农流动	45.65	47.26	7.09
本地流动	44.03	49.84	6.13
外地流动	9.19	84.04	6.77

四、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化影响实证分析

(一)模型采用和变量选取

基于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化影响研究的需要,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进行分析。通过非线性函数连接自变量和因变量,即 $E(y) = \mu = g^{-1}(X\beta)$,同时将因变量方差作为自变量的函数,即 $Var(y) = V(\mu) = V(g^{-1}(X\beta))$。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是基于广义线性模型的扩展,该模型通过引入随机效应和数据分层,较好的解决了数据间的相关过度离散和异质性等问题,理论上能获得更好的估计和检查结果。

采用SPSS22软件的GLM和GLMM模块进行模拟回归,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log(\lambda_{it}) = \gamma_t + \beta_1 period_t + \beta_2 natural_{it} + \beta_3 physical_{it} + \beta_4 human_{it} + \beta_5 finacial_{it} + \beta_6 social_{it} + \beta_7 are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为了反映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化存在的非直线影响关系,另一模型设置如下:

$$log(\lambda_{it}) = \gamma_t + \beta_1 period_t + \beta_2 natural_{it} + \beta_3 natural_{it}^2 + \beta_4 physical_{it} + \beta_5 physical_{it}^2 + \beta_6 human_{it} + \beta_7 human_{it}^2 + \beta_8 finacial_{it} + \beta_9 finacial_{it}^2 + \beta_{10} social_{it} + \beta_{11} social_{it}^2 + \beta_{12} are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因变量 $\log(\lambda_{it})$ 是一个计数变量，代表第三个农户第 i 期的生计多样化种类（y = 0，1，2，…，6），如前文所述，农户的主动生计策略更能反映其生计多样化，因此模型因变量的多样化种类具体指的是种植活动、养殖活动、非农经营等 3 种经营性活动，以及本地打工、外地打工、公共部门工作等 3 种工资性活动。农户参与主动生计活动的数量统计以是否参与该项活动为依据，而不考虑从事该项活动的收入为零或亏本的问题。征地后参与 0 项、1 项和 5 项生计活动的农户数量增多，而参与 2 项、3 项和 4 项生计活动的农户数量减少。平均看征地前主动生计活动为 2.54 项，征地后降低为 1.56 项（表 5）。

表 5　失地前后农户的主动生计活动变化

数量（项）	0	1	2	3	4	5	6	平均（项）
征地前（%）	0.32	11.45	33.87	43.23	10.32	0.81	0.00	2.54
征地后（%）	8.71	50.16	24.35	11.13	4.03	1.61	0.00	1.56
总计（%）	4.52	30.81	29.11	27.18	7.18	1.21	0.00	2.05

$period_t$ 表示征地前后，$area_i$ 表示居住地区，$natural_{it}$、$physical_{it}$、$human_{it}$、$finacial_{it}$ 和 $social_{it}$ 分别表示某个农户某个时期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农户调查数据分别详细记录了失地农户 5 种生计资本的状况，每种生计资本由多个二级指标组成。为了将众多指标合并为 5 个一级指标变量，使用因子分析及其因子综合得分进行计算。最后根据各公因子得分与各公共因子方差贡献率占各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求解因子综合得分。生计资本因子得分具有相对意义，可通过因子综合得分确定每个农户 5 种生计资本大小的排序。从因子综合得分均值看，农户自然资本征地前显著大于征地后，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征地前显著小于征地后，而社会资本在征地前后没有显著变化。限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对具体计算方法赘述。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 5 种生计资本的平方项，以考察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二）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首先，因变量生计多样化数量可能服从泊松、过离散泊松或负二项分布，通过均值与方差是否相等的分布检验最终确定因变量服从泊松分布。其次，从模型的回归结果看，当被解释变量取对数作为联结函数时，Possion-GLMM 和 Possion-GLM 相比其它联结函数都具有更小的 AIC、BIC 值，因此模型采用对数联结函数。第三，由于本数据调查了征地前后两个时期，农户的生计多样化行为可能具有区域聚集性，因此在广义线性回归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进行研究。在变量设置中，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广义线性模型的区域变量只选择城市这一虚拟变量，而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中，则直接将城市、村庄和农户代码作为聚集层次，城市和村庄变量默认为随机变量，其它变量都认为是固定效应变量。

根据拟合优度检验准则，AICC 和 BIC 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由表 6 可知，Possion-GLMM 回归模型（3）（4）总体优于 Possion-GLM 回归模型（1）（2）。而在 Possion-GLMM 中，模型（4）又优于模型（3）。模型（1）（3）和模型（2）（4）的区别是后者将 5 个生计资本变量的平方项纳入了模型。

表 6　不同模型拟合优度 AIC 和 BIC 准则

	Possion-GLMs		Possion-GLMM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AICC	3577.209	3566.918	1382.367	1360.552
BIC	3618.075	3633.219	1402.800	1380.969

表7 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化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

	Possion-GLM				Possion-GLMM			
	(1)		(2)		(3)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0.551***	0.037	0.576***	0.041	0.558**	0.248	0.582**	0.245
自然资本	0.131***	0.033	0.260***	0.060	0.135***	0.019	0.252***	0.252
自然资本平方	–		-0.049***	0.018	–		-0.044***	0.010
物质资本	-0.065	0.043	-0.083*	0.044	-0.079***	0.024	-0.097***	0.024
物质资本平方	–		0.039	0.053	–		0.009	0.030
人力资本	0.146***	0.031	0.122***	0.033	0.100***	0.017	0.078***	0.018
人力资本平方	–		-0.034	0.031	–		-0.027*	0.017
金融资本	0.025	0.027	0.128**	0.050	0.034**	0.015	0.156***	0.028
金融资本平方	–		-0.031**	0.013	–		-0.037***	0.008
社会资本	0.120***	0.047	0.191***	0.072	0.077***	0.026	0.125***	0.039
社会资本平方	–		-0.0076	0.051	–		-0.057**	0.028
城市(1=九江)	-0.278***	0.043	-0.232***	0.045	-0.262	0.347	-0.221	0.342
时间(1=征地前)	0.488***	0.041	0.487***	0.041	0.494***	0.025	0.500***	0.024

注: ***、**、*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为了检验模型(4)的稳健性,表7显示了(1)-(4)模型的回归结果。这里主要以模型(4)为基准,同时兼顾前三个模型的变量显著性情况进行回归结果解释。

总体上看,模型(4)的5个生计资本平方项,除了物质资本平方项不显著外,其他4种生计资本变量的平方项均在0.1水平上显著。物质资本变量的系数为负值,表明随着物质资本的增加,农户减少其生计多样化。首先看自然资本与生计多样化的关系,根据二次函数的图形,自然资本与农户生计多样化存在倒U型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自然资本的增加首先使农户增加生计多样化,但到了某个点($x=2.86$)之后自然资本的增加反而降低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与农户生计多样化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三者的临界点分别是$x=1.44$,$x=2.11$,$x=1.10$。综合比较4个临界点,可以发现生计多样化由增加转为降低的临界点先后顺序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虽然区域变量对生计多样化影响在模型(1)(2)显著,但在模型(3)(4)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广义线性混合模型中将将城市、村庄和农户代码作为3个聚集层次,回归结果意味着农户生计多样化更多是由不同村庄而非不同城市所致,这种结果更为可信。从时间虚拟变量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则征地前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水平更高。

徐雪高认为越贫穷的农户越可能作出风险决策行为,越富裕的农户由于抗风险能力强越可能作出风险决策行为,由此导致农户种植品种多样化策略与财富水平之间倒U型关系[20];陈传波则认为贫困农户和富裕农户分别专业于低收益和高收益活动,经济状况一般的农户则采取生计多样化,从而导致多样化收入来源与总收入水平(贫富状况)之间的倒U型关系[21]。虽然本文所关注的被解释变量是失地农户的生计策略多样化,与前两者的种植品种多样化、收入多样化有所区别,但他们分别从风险和专业化的角度进行的解释,也有助于解释失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多样化所呈现的倒U型关系。低生计资本失地农户实施较低程度的生计多样化,是由于他们实施多样化的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很低;高生计资本失地农户实施较低程度多样化策略,是由于他们抗风险能力较高,虽然他们有能力实施多样化生计策略,但他们更偏好于从事具有更高收益的专业化活动;而生计资本一般的失地农户实施较高程度多样化,是由于他们具有实施多样化生计的能力,但同时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依然较低,从而不敢专业化于某种单一的生计活动。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出发，利用中部地区九江和襄阳两地失地农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问题，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调查地区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作用和特征，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和验证了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家庭层面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机制。本文针对调查地区失地农户的具体分析结论如下：

（一）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策略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关联。征地使农户的种植和养殖收入比重大幅下降，而非农经营、本地打工和外地打工的收入比重明显提高；征地引起纯农户和兼业农户大幅减少，而非农就业和无就业的名义农户均明显增多；征地后农户在农业经营领域大幅减少劳动力，而增加非农活动的劳动力，劳动力流动的突出特征表现为集中在本地非农流动。

（二）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扩展了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从生计资本与生计多样化的倒 U 型关系看，在生计资本达到临界点之前，更多的生计资本意味着有能力实施更高水平的生计多样化；在生计资本临界点之后，农户降低生计多样化并非由于他们实施多样化的能力下降，而是因为更偏好于选择其它生计策略。

（三）生计多样化策略是失地农户获取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在 5 种生计资本中，除物质资本外，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与农户生计多样化存在倒 U 型关系，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反而降低了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积极性，这表明失地农户在重建生计的过程中，并非把生计多样化作为其唯一的出路，而是在收益和风险的权衡下选择某种程度的专业化。这也同时解释了在征地后农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均值增加的情况下，为何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水平反而下降。

研究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户生计多样化的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更重要的是能为政府征地补偿政策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一）公共政策目标上应明确征地补偿政策是为了提高失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农户生计决策系统十分复杂，我们要做的不是帮助农户做决策，而是扩展其生计决策的能力，而增强农户决策能力的核心在于提高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二）在失地农户达到各种生计资本的临界点之前，生计多样化是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毕竟这种政策提高了农户改进其生计安全和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能力[5]，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针对贫困的弱势农户，帮助他们发展生计多样化。（三）不同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是不同的，失地农户更希望根据其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最合意的补偿方式，各项生计资本超过临界点的农户，可能更偏好于专业化的生计策略，因此政策上不妨给予失地农户更多的补偿方式选项，比如融资支持、专业技能培训、创业指导等等。

参考文献：

[1]徐琴. 可行能力短缺与失地农民的困境[J]. 江苏社会科学，2006(4)：140－144.

[2]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 管理世界，2007 (6)：45－55.

[3]高进云，周智，乔荣锋.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土地征收对农民福利的影响测度[J]. 中国软科学，2010 (12)：59－69.

[4]邓大松，王曾.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调查[J]. 经济纵横，2012 (5)：53－57.

[5]ELLIS F.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35 (1): 1－38.

[6]BLOCK S, WEBB P. The Dynamics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Post－Famine Ethiopia[J]. Food policy, 2001, 26(4): 333－350.

[7]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 IDS Discussion Paper, 1992.
[8]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R]. IDS Working Paper, 1998.
[9]HUSSEIN K,NELSON J.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R], IDS Working Paper, 1998.
[10]ELLIS F.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MOSER C O N. The Asset Vulnerability Framework: Reassessing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J]. World development, 1998, 26(1): 1-19.
[12]熊吉峰,丁士军. 西部贫困地区新农合制度补偿经济绩效及影响因素[J]. 求索,2010(1):6-8.
[13]苏芳,蒲欣冬,徐中民,等.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6):119-125.
[14]李聪,李树茁,梁义成,等.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2010(3):77-85.
[15]苏芳,徐中民,尚海洋. 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J]. 地球科学进展,2009(1):61-69.
[16]CRAMB R A, PURCELL T, HO T C S. 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of Rural Livelihoods in the Central Highlands of Vietnam[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4, 81(3): 255-272.
[17]赵雪雁,李巍,杨培涛,等.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4):111-118.
[18]ABDULAI A, CROLEREES A. Determinants of Income Diversification Amongst Rural Households in Southern Mali[J]. Food policy, 2001, 26(4): 437-452.
[19]阎建忠,吴莹莹,张镱锂,等.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J]. 地理学报,2009(2):221-233.
[20]徐雪高. 农户财富水平对种植品种多样化行为的影响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1(2):12-18.
[21]陈传波. 农户多样化选择行为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07(1):48-54.
[22]马志雄,丁士军. 基于农户理论的农户类型划分方法及其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2013(4):28-38.
[23]罗必良,刘成香,吴小立. 资产专用性、专业化生产与农户的市场风险[J]. 农业经济问题,2008(7):10-15.

Research on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Encountered by Land Lost Farmers

MA Zhi-xiong[a], ZHANG Yin-yin[b], DING Shi-jun[a]
(*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land-lost farmers in Jiu-jiang and Xiang-yang cities, this study depi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land-lost farmer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livelihood assets to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by model of GLM and GLMM.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there's some correlations between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and household income, degree of sideline businesses, labor migration before and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 2) the ability to diversify livelihoods depend on certain livelihood assets, and improvement of livelihood assets expands the ability of peasants to implement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3)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velop livelihoods, but beyond certain critical points of livelihood assets, diversification will no longer be an optimal choice.

Key Words: land-lost farmers;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livelihood assets; income level; sideline business of farmers; labor mobility